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

马连儒卷



兰州大学出版社

以人说史集

C53
C572
5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

以人
说史
集



马连儒卷



S3K55/06



2001733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马连儒卷:以人说史集/马连儒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ISBN 7-311-02083-2

I. 当... II. 马... III. ①社会科学一文集②马连儒一文集③中国共产党—历史人物—研究一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1050 号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马连儒卷

以人说史集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市残联福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96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7-311-02083-2 全套定价:180.00 元
(共十册)

“丛书”总序

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克非先生对我说，要为六十岁以上、七十岁左右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出版一套人文社会科学论著自选集。其中，史学类要我帮忙编选十卷一辑。我想，这可能有两个理由：第一，是八十岁上下的大学者，多有出版家为他们周密策划出书事宜。有的大学者的文集、文选不知重复出版了多少套，而六七十岁的少名或无名的“青年老头”却少有人来问津。说穿了是因为后者的著作不能为出版者赚钱，甚至还要蚀本。第二，是有官衔的“学者”，因为有权势在手，不管他有学问没学问，也有办法（例如用公款支付出版费用，甚至公然买书号）令出版社为自己出文集、文选。据我所知，某些“长”字号的此类书籍，就是这样堂而皇之地出版的。即使没有人买没有人读，他们也会巍然送入，到处张扬。这两条理由，不知道克非先生是否认同，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兰州大学出版社的盛情，令我感动和钦佩，因而不辞自身学养之浅陋，当即答应为他们选荐作者。出版社的标准就是我的选荐标准：只问学问，不问官职；只选六十至七十岁之间或略大于

七十岁的学者。这时，我不由想起季羨林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的
的一段话：

人文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有很大不同的。科学技术专家，一到六七十岁退休的年龄，有的耳有点不聪，有的目有点不明，难以再进实验室，拿手术刀手也发颤，只好退而且休了。而人文社会科学家，则到了这样的年龄却是如日中天，正是读书写作的大好时候。即使耳目有点小毛病，甚至大毛病，也无大碍。此时，他们书读得越来越多了，知人论事的能力越来越强了，通古今之变的本领越来越高了，究天人之际的愿望越来越旺了，即使遵章退休，也往往是退而不休。

我完全赞同季老的高论，且有所补充。照我看，中国的六七十岁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大多在人生和学术道路上坎坷多难，饱经风雨沧桑，不乏伤心切肤之痛。然而，他们从未颓唐不振，反而因为心灵深处拥有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独立思考 and 敢于重新评估一切的怀疑精神，使他们晚年生活追求中始终不曾忘却对人文社会科学尽自己一份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他们虽面对权威和虚假，却甘于清贫和寂寞，以信念、醒悟和批评，诉求真实，尊重歧异，鄙弃教条，质疑权威，敢于应对非学术因素干扰下学术领域的种种挑战。

我的专业是研究1840年以后中国近代史，所知只有一百多年的史事，而对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则知之甚少。不负所托，为了审慎地选荐丛书各卷作者，我便向这两个学科的专家和老朋友请教。世界史，我请教于苏俄史专家陈之骅先生；中国古代史，我请教于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之骅谦虚地说他自己的文章暂时没有时间整理，他诚恳地推荐英国史专家王章辉先生，王先生欣然俯允。春瑜除承诺自编一卷外，又热心推荐汉唐史专家张泽咸

先生、宋辽金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张、王两先生亦积极响应。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我敦请王桢林、张注洪、马连儒、唐宝林四位先生予以支持。桢林先生以主编《中国现代史》（高校教科书）、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抗日战争史而名满学界。注洪先生以研究中国现代史料学与信息学而著称。马连儒编审主持《人物》杂志多年，对中国现代历史人物研究既深且精。唐宝林研究员近二十年间以研究陈独秀和托派历史知名于海内外。在以上八位先生的选荐过程中，我始终在寻找马大正先生。他是边疆史地和少数民族史专家，我虽不研究边疆史地，但一向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大正其时正在新疆考察，直到一个月后才联通敲定。

九位先生中，六位是旧雨，三位是新朋且从未见面。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汉、唐、宋、辽、金、明、清、民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和英国史诸学科。我稟性愚鲁，才疏学浅，对上述许多领域相当外行，不敢妄评诸公学术成果，但据平时涉猎，参照学界品评，我深信他们都是各自学科中的一流学者。在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他们以其非凡的学术成果为本学科作出了独特的有些是无可替代的学术贡献。这种贡献的深层意义，在于他们摆脱了长期流行并主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二元思维定势”，即非好即坏、非美即丑、非善即恶的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人们可以见仁见智，乐山乐水，可以提出种种批评见解，但在学德和文品上，他们绝不会愧对广大读者，这就是：

——历史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诚，是无所禁忌，秉笔直书，而非附庸政治的奴婢。

——历史学的第一标准是真实，是信史，是史镜，而非“胜利者的宣传”。

我坚信，这应当是时下和未来历史学主体和客体的正确的发

展方向。这也是高悬于我和所有作者面前的崇高的目标，追求之心不敢稍懈。

陈铁健

壬午谷雨後四日，京東亮馬河畔水南齋

自序

承蒙兰州大学出版社策划、铁健兄的荐介，本人被列入这批自选集之一，实感荣幸。选集自拟书名，考虑多年来的实践，我觉得称“以人说史”比较恰切。

以人说史，就是以人来讲述历史。以人说史的由来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以前，中国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就是以人说史的始祖，开创中国纪传体写史的先河。比他晚近两个世纪的古罗马时期希腊的伟大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不约而同与司马迁有同样的见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梁启超遵先贤遗训提出了“以人物作本位”的史传观点。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则盛赞司马迁“不拘于史法，不囿于文字，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历史是一个变化万千、多彩绚烂的时间画廊，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的参与才使这个没有穷尽的画廊充满了亮丽的奇绝和动感的魅力。人是历史的载体，历史是由于人的主体活动才构成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研究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对人的社会活动进行研究。这正是我多年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不懈追求。

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大批无阶级革命家领导亿万中国人民

从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进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历史。历史是他们创造的，只有他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忘我建树的光辉思想，才最充分体现着时代潮流之所趋、人心之所向，才最深刻最生动地代表着奔腾前进的伟大时代。一部优秀老一辈革命家传记，其意义远远超越了记录个人身世的范围，而是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一曲可歌可泣的不朽乐章。读老一辈革命家传记，就是在读一部中华民族的救国史、革命史，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奠基史、创业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奋斗史、发展史。

老一辈革命家传记的历史价值，还不仅仅是一般的再现历史，它可以比历史更丰富、更具体、更形象，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多侧面地观照当时复杂社会环境、家庭背景、人际关系以及具体展示这些情况的言论、行动、历史场面、重要情节和具体细节，把死的、呆板的、凝固的历史变成一幕幕由人演出的威武雄壮的活剧，有声有色，可亲可感，较历史更吸引人、更折服人、更打动人，犹如亲睹其事，亲闻其语，甚至可以达到须眉欲动、字字传神、绘形绘声、出神入化的境界。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传记，不仅再现他们一生所从事的革命实践活动，更着重于挖掘指导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思想根源和内在动因。追寻他们的人生足迹和思想发展的心路历程，探求人生的价值，找出历史发展的轨迹，从而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一个革命家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实践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传记为什么总是把再现革命家思想发展和转变历程放在突出地位并花很多精力和时间加以研究和评论的重要原因。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给读者以最珍贵的人生启迪，引导他们创造新的历史和世界。

老一辈革命家传记的社会价值还表现在，他们的生平思想和

业绩，要比其他作品中描述的人物更为真实、准确，再现的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和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凭空捏造和虚无缥缈的虚构，加上许多传记作品写得真切而富于感情，使读者同人物一道经历社会的动荡、纷飞的战火、曲折的征程，乃至人生的悲欢离合、生活的酸甜苦辣，亲身感受到他们胸怀理想、笑洒热血的献身精神；叱咤风云、赴汤蹈火的战斗意志；淫威不屈、利诱不腐的政治品格；全局在握、高瞻远瞩的广阔胸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他们不愧是民族的、时代的、阶级的卓越代表。

司马迁说过，他作《史记》的初衷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同样，一个党史人物传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在于正确总结 80 年来中共党史上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作今日之鉴镜。因此，史传作者必须像汉代班固引用刘向、扬雄的话称赞《史记》那样：“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真实是传记的生命，只有秉笔直书、存真求实，不趋势、不媚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真、只唯实，才能真正做到取信当代，遗教后人。

真实是传记的生命。所谓真实，就是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对传主的主要思想和事迹加以记述、分析和评价。它的最大敌人是造假的虚构。我国古代史传作家常说的“考文征献”、“崇实斥伪”就是这个意思。长期以来，对党史人物，特别是对某些领袖人物一味美化、神化，人为拔高，为“贤者讳”、“尊者讳”，堆积许多美丽的词藻，廉价地加以吹捧颂扬，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此我们要严加反对和贬斥，并群起而攻之，让这种历史一去不再复返。

真实是传记的生命。要做到真实，就要客观历史地再现传主的思想发展。老一辈革命家一般都经历过从封建到反封建、从反封建到民主主义、从民主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系列的重大思想转折。写好这些转折，必须根据传主的一生所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和个人追求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述。如党内的五老（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谢觉哉），多数是前清的秀才，他们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就十分漫长，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失败，最终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而毛泽东、周恩来等对比这些前辈则是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这一代人都受到过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如无政府共产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论等等。而对五四时期流行的各种救国主张也要进行具体分析，如对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就不能一概而论，把这些都看作是革命救国理论的对立面，简单地加以贬斥和否定。在当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时代的高标，时代的理想和追求，与此同时还存在各种进步思想，如胡适的实验主义、蔡元培的教育革新论等等，不能提倡马克思主义就否定这些符合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理论观点，再也不能重复过去什么都“论阶级”、乱“贴标签”、“简单化”、“一刀切”的思维定式了。人类的各种先进物质成果和文化成果都可以为我所用，一味地拒绝和否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真实是传记的生命。要做到真实，就要对传主的不同环境、不同阶级、不同问题、不同方面的思想发展做出比较清楚的研究，搞清其由来和发展，找出其转变的关键或症结所在，正确评价其作用和影响，不能固定地、一成不变地看人、对事。如何评价党史人物的功和过、挫折和失败，是对史传作者研究水平和能力的一大考验。功过或挫折失败评价起来十分复杂，涉及到众多人和事的各种矛盾。有些事实由于历史的原因又难以说清楚，这

就为做出恰当的评价带来了许多困难。在历史事实基本清楚的情况下，要做到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在史传中不能因为后期有过甚至罪，就否定前期的功；同样，也不能因前期有过甚至罪，就否定后期的功。对于挫折失败也要具体分析它产生的历史环境、客观条件、主观因素，尤其是当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对其重要影响，要对错误的事实、认错态度、实际改正情况进行冷静、公正的评价。人是发展的、变化的，功过或挫折失败的产生总有历史和人为的原因，找到其变化的因由和根据，有时比功过本身更重要。俄国伟大的传记作家高尔基就说过：“优秀的，使人入迷的传记能够使愚昧者、自甘堕落者、迷惘者，寻觅到良知的力量，从逆境中站起，重新获得人格、尊严、荣誉和理想。”永恒、真实的垂世丰碑，公正地记录人生的历史、事件和人性的生衍和发展，会给人无比的鼓舞和力量，肯定会鼓荡起他们理想的风帆。

真实是传记的生命。要做到真实，就要有敢于讲真话、讲实话的胆量和气魄。如李大钊是我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但他早年在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曾经经历过一场重大转折，大胆而公正地评述这一思想转变，对纠正长期以来说他“始终反袁”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何香凝是一位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和妇女伟人，但她在大革命失败后曾一度迷惘、彷徨，甚至对中共有贬损之词，真实讲述这段历史，特别是赞扬她后来虚心自责、自我批评的精神，使我们对她格外由衷敬佩。老一辈革命家邓子恢在农村工作部工作十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三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说他是“小脚女人”，是“右倾机会主义”、“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大批解散农业生产合作社”，甚至说他在农村工作部“十年没有办一件好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历史证明，邓子恢是中国主张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的主

张,“实际上是1978年后中国农村改革的先声”(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1959年党的庐山会议上,“舍得一身剐”的彭德怀上报党中央的意见书,其实不是“分裂党”,更不是“逼毛主席下台”,而是代表亿万农民而发出的呐喊。加在彭德怀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理所当然地被历史所否定。敢于讲真话的李立三,1957年直接上书毛泽东,对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将其与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饶漱石并称为“知识分子中出的坏人”提出质疑。毛泽东接受他的意见,在正式发表这个报告时作了修改。李立三坚持讲真话一直到死,拒绝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绝对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直至含愤离世,拼死抗争。

真实是传记的生命。要做到真实,就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刻苦钻研史料,对搜集来的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入里的分析鉴别,反复查对核实、多方考察印证,特别是对若干回忆资料,不能听信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记忆,要尽量找到文字资料加以核实。对于相互矛盾的不同看法,要慎重处理,切忌道听途说,轻易对重大事实作出判断。对于一时搞不清楚的问题,可以存疑,一说、两说、多说并存都是正常的。对于某些故意歪曲事实、凭主观感情一意为之的做法,不能无原则地迁就、听信,甚至需要排除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真正做到对党、对人民、对传主负责的一致性。

真实是传记的生命。要做到真实,必须按照人物的本来面目真切地再现本质的历史。这就需把获得的原始资料,进行精细加工制作,从感性上升为理性。注意纵横双向考察的有机结合;做到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的内在统一;对材料取精用宏、精选严释;结构有主有从,有明有暗,承前启后,有条不紊;谋篇布

局，要有曲折起伏，富于变化，引人入胜；文字要清新可读，生动朴实，娓娓动听，调动一切手段，为真实性服务。只有最本质的，才是最真实的。传主所作的诗文像一扇窗口敞开了自己的心灵，能让人透彻了解传主的复杂心理和真情律动，具有画龙点睛之妙。要将刘知几倡导的“史学”、“史才”、“史识”和章学诚倡导的“史德”熔为一炉，在一团血性的体验里和满怀性情的流溢中，展示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凛凛之气。

以上就是我的史传观，按照这种史传观，从我写过的两百多篇文章中选出 37 篇分成六组编成这个自选集。第一组辑录文章 12 篇，是研究蔡和森、彭湃、王若飞和谢觉哉的重要历史贡献和思想发展的成果；第二组辑录文章 9 篇，着力探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立三、苏兆征、邓中夏、向警予、叶挺、林伯渠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时代特征和思想风貌；第三组辑录文章 5 篇，展示了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元帅的强烈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精神风采；第四组辑录文章 3 篇，展示了对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的研究成果，其中一篇《徐向前元帅的黄埔情缘》在现实与历史的结合上颇有感悟；第五组辑录文章 3 篇，表明从大学以来钻研杜诗的矢志未改，只要有机会就提笔成篇，其实这也是本人史传观点的又一体现；最后一组辑录了史传言论 5 篇，拙言浅见，立此存照而已。

马连儒

2002 年 2 月于北京晨曦园

目 录

丛书总序	1
自序	1
蔡和森对中共建党理论的卓越贡献	1
蔡和森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15
关于“富农问题”的一场争论	52
从蔡和森对陈独秀的批判中得到的启示	64
实事求是地评述领袖人物的思想发展	
——读《彭湃传》	68
运用比较法论彭湃与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的历史地位	
	71
彭湃传记刍议	93
王若飞的思想发展	108
谢觉哉的前期思想	144

“四老”苦乐共长征	192
三十年风雨心声	
——读《谢觉哉日记》	203
谢觉哉诗词创作简论	207
中共反对腐败的首倡者	223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谈瞿秋白狱中四首词	229
敢于讲真话的李立三	234
戳穿“纸老虎”	
——苏兆征与香港海员大罢工	237
“秋水含落晖，彩霞如赤炷”	
——邓中夏的最后岁月	243
鲜血染红五一节的黎明	
——向警予生命的最后岁月	249
叶挺与广州起义	255
中国最早歌颂十月革命的诗作	260
用生命写成的诗	263
讲真话 行真事 做真人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后	266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刘伯承 1958 年受到不公正对待前后	272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贺龙入党前后	277
诤友风采	
——陈毅在红四军的一场风波	284
“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白求恩与我国老一辈革命家的友谊 ——	291
黄埔军校与北伐战争	
——纪念北伐战争六十周年 ——	296
黄埔师生在抗日战争中	
——纪念七七抗战五十周年 ——	301
徐向前元帅的黄埔情缘 ——	308
要历史地评价杜诗“三吏”“三别” ——	323
为“一德兴亡”而“冒死称述”	
——论杜甫疏救房琯 ——	330
杜诗二首鉴赏 ——	349
《人物》百期献辞 ——	352
为传记的真实性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 ——	358
求实 创新 可读 ——	360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	365
近年来老一辈革命家传记述评 ——	367